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 桂诗春

## 自选集

GUI SHI CHU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桂诗春 | 自选集

GUI SHI CHU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桂诗春自选集/桂诗春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9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601-2

I. 桂… II. 桂… III. 应用语言学—文集 IV. H0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8951 号

|      |                                   |
|------|-----------------------------------|
| 责任编辑 | 杨小虹 黎捷                            |
| 封面设计 | 张力平 吴德灏                           |
| 责任技编 | 虹峰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刷   |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
| 开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张   | 26.75                             |
| 插页   | 2                                 |
| 字数   | 300 千                             |
| 版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218-05601-2            |
| 定价   | 53.00 元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s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sh.com](mailto:sales@gdps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25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作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类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18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18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著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 学术自传： 我的应用语言学之旅<sup>①</sup>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0年在香港中学会考后，即回广州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当时并没有什么统一招考，不少学校的考试时间相同，所以只能挑选学校。我的选择多少有点盲目，主要是想离开南方远一点，多看一点祖国的大好河山。我选了华北高校联合招考中的北京大学和单独招考的武汉大学。结果都考取了。我去了武大，想不到三年后，又因为院系调整，回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最后在中大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系毕业，留校任教。我学的是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在中大工作的10年中教的也是英语课和文学课。这可以说是我的“正途”，“文革”后，我才转向应用语言学。

我把这叫做应用语言学之旅，因为：第一，我并没有受过语言学的严格训练，连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语言学引论》都没有修习过，也没有修习过更为专业的课程。确实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第二，在语言学的路上，景物繁多，应接不暇；但作为旅客却有比较大的自

---

① 限于篇幅，本集只收录1990年以后发表的部分文章。

由度，可以驻留细看、仔细玩味，也可以游目骋怀、一览而过。第三，和任何旅途一样，我的应用语言学之旅也不是没有目的地的，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这一辈子都和英语教学打交道，因此，我的目的就是解决我国学生学习英语的问题。

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向？1988年，我写过一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应用语言学与我》（1988b<sup>①</sup>），归纳了我在外语学界的头30年：“十年准备、十年荒废、十年开垦。”文章里面谈到了我转向的原因：“在我从事外语教学的这个十年里<sup>②</sup>，我国英语专业教学逐步形成了一个模式，可用‘文学道路’来概括。按照这个模式，一、二年级打语言基础，二年级开始读简写本，三年级以后逐渐向文学原著过渡，并开设各种文学选修课。‘文学道路’不失为一种模式，对培养英美文学专业人才来说，确应如此；就是不专攻英美文学专业的，也应多读几本英美文学大师的名作，这就等于学汉语的外国人也总应该接触一下《红楼梦》、《水浒传》一样。但是把它作为学英语的‘必由之路’却大可研究，因为我国需要的是各类英语专业人才，而不只是英美文学专业人才。主张这种模式的同志还有一种说法，‘文学有后劲’。这自然有其道理，因为文学名著是语言范本，多接触一些所学语言的高级表现形式，自可提高语言素养。但是真正的‘后劲’来自语言基础；语言基础不稳，就无法接受这些高级表现形式。有的学生语言基础未打好，就上

① 指同一年发表论文的先后次序，下同。

② 指从1955到1965年。

较多的文学选修课，到了毕业时，无非是多懂得一些英美文学事实；参加工作后，亦未见有多大‘后劲’。因此，‘文学道路’是否学外语的‘必由之路’可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辩，通过多方面的实践去解决。但是到了1964年，在‘左’的思想干扰下，‘文学道路’却作为教改中的绊脚石而受到批判，把学生中的‘外语聋哑病’都统统归咎于它，却也未见公允。‘文革’以后，‘文学道路’的案子被翻过来，理所当然；但我觉得，应该翻的是不应对‘文学道路’实行粗暴的批判，但也没有必要把‘文学道路’作为‘必由之路’而全盘肯定。1964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少数外语院校代表参加的外语教育改革座谈会，我也参加了。会上介绍了北方外语院系教改的情况：除了批判‘文学道路’外，还介绍了听说法的教学试验。会上认为当时教改要以教学法为突破口。回广州以后，我们在中大也在一、二年级开展试验。在一年级还找了一个试验班试用 H. Palmer 的通过动作学英语的教学法试验。可是当时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区区的教学法改革当然适应不了‘文革’的‘需要’，很快也就夭折了。

“在十年动乱中，我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场噩梦，也无须细说。心灵中最大的创伤是幻灭感：以前种种，一笔勾销；以后种种，一片迷惘。在‘文革’中，我虚度了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那一段十分宝贵的岁月；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西方崛起了一门新学科——应用语言学。

“1973年，我有机会和几位英语教师一起应英国文

化委员会的邀请访英一个月。当时‘四人帮’尚未倒台，我们访英是为了实现中英文化交流协议的一个项目，并非是当局对我国英语教学的改革有什么想法。我们在国外带回了一点书，也因为书的封面有‘政治问题’而被上缴没收。而且回来后不久，就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并由此掀起‘不学 ABC，照样闹革命’的反对学习外语的高潮。我们出去的几位同志尽管颇有所感，但大都噤若寒蝉。

“1973 年之行对我的‘转向’起了决定的作用。出国前，我有机会通读了被视为第一本应用语言学教科书——M. A. K. Halliday (1964) 等三人所著的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算是得到一些启蒙。到英国后，我们被安排在 Essex 的一个语言中心，然后英方请各地的一些名家来给我们讲学，如 Edinburgh 大学的语言学系主任 P. S. Corder、Essex 大学应用语言学系主任 P. Streven，英国小学外语改革规划的负责人 A. Spicer，英语教材编辑专家 L. Alexander，等等，另外还到伦敦、剑桥的一些中学和英语训练中心参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英语教学（对外国人），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已沦为二等强国，一些英国教师不无感慨地对我们说，‘英国只剩下两件宝：协和号飞机与英语教学’。现在英法联合试制的协和号在和美国波音飞机的竞争中已败下阵来，大概英国人尚能夸耀的只有英语教学了。”

英国归来后，我决定转学应用语言学，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尚十分恶劣，而我已经步入中年了。我的抉择

出于下面几点考虑：

1. 我对自己能否再搞文学信心不足。过去教文学史主要是靠前苏联那几本外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那些文学史采用简单的、庸俗的政治划线的办法去对待复杂纷繁的文学事实，苦了我们这些教师先生。因为政治标准不稳定，于是今天翻这个案，明天翻那个案，后天又把前天翻了的案再翻过来……我怀疑这种模式，却又找不到可供替换的模式。另外，为了教文学史，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读一些我丝毫不感兴趣的作品，亦一大苦事。有的作品卷帙浩繁，像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传》，没有兴趣，实难以卒读。但是世界上又恐怕没有几个人对文学史上的所有名家、名作都感兴趣。“文革”中投下的阴影仍然深深地笼罩着我们，我在1960年初期曾写过一篇论文《奥德赛主题初探》，企图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中所阐述的观点来讨论荷马这部史诗的主题，认为史诗产生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时代，其主题思想应该是歌颂希腊人为巩固新的社会秩序（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而作的斗争以及这斗争的胜利。我自以为这是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史诗，但在“文革”中却被批判为恶毒影射人民公社解体、反对“三面红旗”的大毒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产生弃旧图新的念头。

2. 看到了应用语言学的强大生命力。根据 L. Kelly 的说法，语言教学有 25 个世纪的悠长历史。但是语言教学一直都是经验性的、“自在的”教学活动。应用语言学的诞生使语言教学成为一门独立的、“自为的”科学，这既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同时又具有很大的实用

价值。另外，一些新兴的语言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等，对我又十分有吸引力。这些学科的引进对我国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都会有促进作用。我们在英国一间综合中学的高中毕业班里听过一堂课，颇有感触，这是一堂英语课，老师上课先放几段录音给学生听，其中一段是女售货员的闲谈，一段是牧师的传道，一段是丘吉尔的战时演说，一段是教师的谈话。听完后，教师就引导学生们讨论，这几段话是什么人讲的？其职业、文化水平、年龄、籍贯等能否猜出来？他们讲话中有些什么语言特征、色彩可作为证据？学生们经过一段生动的讨论，终于都猜出来了，课后，我向任课教师请教，原来在高中毕业班里，英国文学与英国语言分设两门课。他当即送了我一本语言课的教学大纲 *Language in Use*<sup>①</sup>，整个大纲共有 110 个单元，从各个角度去教怎样使用母语。Halliday 在大纲《前言》中指出，这是以伦敦大学普通语言学系为基地，组织了一批专家工作了六年的结果。这是一个应用语言学的实例。反观我国，中学的汉语教学，甚至大学的现代汉语课，都是语文不分，以文代语，好像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汉语使用上已经不成问题，便把精力全放到文章分析上面。要改变这种状况，出路在于普及语言学

① *Language in Use* 一直在网上流传到本世纪。Halliday 最近一次来广州还和我津津乐道此事，谈到当时的 Nutfield Foundation 有眼光资助几位语言学家来进行英国的语文改革，在中学中“语”和“文”并重。其实在中国，吕叔湘、张志公几位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却没有受到这样重视。

知识并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改革中去。

3. 我也分析了自己的条件。有不利的一面，如过去接触自然科学，甚至行为科学比较少，数学基础特别差；但也有利的一面，对英语教学的接触面较广，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书亦有所涉猎，而且对自己从中学以来逐步培养起来的自学能力，还有信心，至于我们学院，还有好几位同志一直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条件比我还要好。

所谓“转向”者，并非单指个人研究方向的转换，而是指在中国建立起应用语言学这样一个学科，让我国广大的英语教学置于一个科学的地位。我在1978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指出：“我们当务之急是引进这个学科，组织我国广大教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吸收这个学科的精华，逐步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符合我国的应用语言体系。有一种思想需要廓清：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只要提高语言水平就足够了。不必讲究什么方法。其实，语言教学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随心所欲的东西；怎样把教师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要取得这样的共识，也不容易，所以到了2004年，我在《中国外语》第1期所发表的《我国外语教育的根本出路》（桂诗春2004）还进一步讨论把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深远意义。<sup>①</sup>

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需要有一个契机，我们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抓到了这个契机：一是“文革”期间所实

① 见自选集的《我国外语教育的根本出路》。

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我们和国外的科学新发展隔绝，“文革”后百废俱兴，大家都有一种迎头赶上的迫切心情；二是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而培养外语人才又需要一个科学观；三是中山大学英语专业的一批教师合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那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校，有比较大的空间去伸展拳脚。于是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请外国专家来办英语语言学培训班，筹办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有目标地购置和订阅学科所需的图书和杂志，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创办《现代外语》杂志，编写和出版教材，召开国内和国际的应用语言学会议，建立学术联系），这也不必多说。我只想谈一点我个人的学术历程。

我是从应用语言学开始的，然后从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以外语教学为研究对象）向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如心理语言学、语言学方法论、语料库语言学）逐步延伸，在旅途中留下了一些履痕鸿爪。大体都经历过相同的学习—思考—应用的过程。例如在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方面，我首先接触的是上述 M. A. K. Halliday 三人的书，然后是 Corder 的《应用语言学导论》、四卷集的爱丁堡应用语言学教程。经过一段思考和整理资料的阶段，首先在当时（1981）的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硕士班里开出《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课程，并于 1988 年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学系列教材》之一，出版为《应用语言学》。这本书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围绕语言的定义展开为语言本质的八个方面，介绍了理论语言学、语言哲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实验语音学、语义学的一些

基本知识，以及它们对外语教学的启发和应用。在上这门课时，我一开始就对学生说，这不仅是一门课程（应用语言学）的导论，而是整个硕士课程的导论。在理论探究的早期，我比较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它不仅是人们所说的是一种“活动”、一个“过程”，而且是一项“系统工程”（1988a：5~6；1994a）。二是应用语言学的真谛在于给教师以启发，学习应用语言学不要追求简单的、直接的“应用”（1980）。但是应用语言学毕竟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获得启发后，再通过自己体验，结合实际去应用，天地就更为广阔。所以我们一边在引进和推广理论，一边还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外语改革。例如李筱菊教授所进行的交际法试验，我所进行的中国学生英语词汇量调查（1982a；1985b），我所做的中国英语专业学生社会心理调查（1986a），在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领导下，我和李筱菊教授、李崴副教授所主持的英语高考改革（桂诗春、李筱菊、李崴1986；1988）都可以算是应用语言学在中国的一些重要的实践，得失成败，自有后人评说。但对我们这些应用语言学者来说，重要的在于摆脱了对外语教改的思辨性的考虑和讨论，走向了尝试和实践的新天地。我尝试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我国要使考试现代化，必须实行“四化”——制度化、专业化、标准化和电脑化（1982b），并且摸索我国实现考试现代化的道路（1986b），包括建立题库（1991d）、实现用项目反应理论来进行试题等值（1991c）、澄清一些对标准化考试的误解（1995；1999c）等等。

心理语言学是在心理学和语言学边缘上产生的一门

科学，也可以算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习得、学习和使用的心理过程。在我的应用语言学之旅中，它和应用语言学一起成为吸引我的两大景观。从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我就给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心理语言学》的课程，差不多有20年，先后出过三本教科书《心理语言学》（1985a）、《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1991a）、《新编心理语言学》（2000）。《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还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这三本书是每隔五年更新一次，主要原因是这个学科发展得很快。《心理语言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而扼要地介绍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成果的导论。《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强调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合流，介绍了不少认知心理学中关于语言的内容。《新编心理语言学》增加了心理词汇、意义表征、句子理解、语篇理解、言语产生等章节，介绍了这方面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强调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我们又申报了“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并受到国家教委的资助。研究成果有17项，结集为专集《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1992c），其中有基础研究，如《中国英语学生的心理词汇研究》（桂诗春）、《中国学生词汇检索的语音编码问题》（桂诗春、李岚）、《句子短时会述的汉英比较》（桂诗春、李岚）、《原型理论初探》（亓鲁霞）；也有应用研究，如《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方式调查》（王初明）、《交际策略在外语交际中的运用》（陈思清）、《外语听力策略个案》（王初明、亓鲁霞）、

《影响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理解的主要因素》（李绍山）、《外语阅读是语言水平问题还是阅读问题》（王初明、亓鲁霞）、《语义知识在句子处理中的运用》（沈三山）、《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是句子的主题突出现象与母语转移》（陈建平）、《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形容词次序的问题》（桂诗春）、《提示在语言测试中的意义和作用》（张权）、《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词汇能力的测定》（曾永强）、《阅读测验中的速度参数》（季刚孟）、《PDP神经网络的应用》（李崴）等等。对于我们的这些研究，我作了初步的归纳：

1. 语言是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处理是在认知的制约下进行的。认知的范围很广，从知觉、记忆、知识、情感、动机、策略、性格，直至思想、信念、文化，都足以影响英语学习的过程。必须在这些领域开展研究，才能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的路子，而不能急功近利，寄希望于找出一种××式、××氏英语教学法。

2. 认知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基础，英语和汉语也有共同的基础，有的已为人所认识，但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我们去探索。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挖掘得不深。原因很多：或者是未注意到，或者是未能从认知科学的高度去考察，或者研究工具太落后。共同性是我们提高英语教学的重要依据，不能忽略。另一方面，英语和汉语又是语言体系很不相同的两种语言，这些语言体系的差异也有它们的认知根源，可以追溯到知识结构；信念体系、文化背景的不同，只有溯本求源，才能找出帮助中国学生克服干扰、促进转移的有效方法。表面的形式